

# 上古汉语声调问题研究述评

卓颖杏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1日

## 摘要

文章围绕上古汉语声调类别这一核心问题, 系统梳理了自清代至近现代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综述了古无四声说、古有四声说、古无去声说、古无入声说、古有二声说、古有五声说及辅音韵尾脱落说等不同主张, 其中以“古有四声说”影响最为深远。全文通过厘清各派学者的论证逻辑与材料运用, 揭示上古声调研究的进展与难点, 指出受材料所限, 诸多问题仍无定论, 有待新视角与新证据的推动。

## 关键词

上古汉语, 声调, 韵尾

#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Tone Issues in Old Chinese

Yingxing Zhu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March 20,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 Abstract

The article centers on the core issue of tonal categories in Old Chinese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ain academic viewpoint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modern era. It mainly reviews different propositions such as the theory that ancient times had no four tones, the theory that ancient times had four tones, the theory that the departing tone did not exist in ancient times, the theory that the entering tone did not exist in ancient times, the theory that there were two tones in ancient times, the theory that there were five tones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theory of the loss of consonant finals, among which the “four tones in ancient times” theory has had the most profound influence. By clarifying the argumentation logic and material usage of scholars from various school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progres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tones, pointing out that, due to limitations in the materials, many issues remain unresolved and require new perspectives and evidence

to advance.

## Keywords

Old Chinese, Tone, Rhyme End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声调在现代汉语中被定义为“依附在音节上的超音段成分，主要由音高构成”，属于非音质音位。然而，从对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的研究来看，这一定义及其内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纵观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程，中古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已取得较为扎实的成果，且学界共识相对稳固。相比之下，上古汉语的研究则仍显薄弱，尚未形成统一体系。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上古语音材料极为有限，仅凭借《诗经》《楚辞》等韵文的押韵材料、《说文解字》所保留的形声字谐声系统，以及散见于文献与对音资料中的零星证据。按理说，基于相近的材料，运用系联、归纳、比较等基本研究方法，所得结论应当趋同或大体一致。然而学术史上的实际情况却是，各家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明显分歧乃至对立。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审视不同学者构建其理论的过程，仔细辨析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与论证逻辑，进而判断哪些观点更具说服力，哪些结论因材料局限或方法疏漏而显得不够严谨。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厘清上古声调问题的实质，更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的学术参照，使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得更加稳健、深入。

## 2. 清代及清以前学者的观点

中古诗人在用韵时注重同声调相押，以追求韵律和谐。然而，在考察《诗经》的韵脚字时，若按中古“平、上、去、入”四声去分析，便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异调相押的现象。这一现象引发了学者的深入思考：上古汉语究竟有没有声调？若有，又有几个声调？清代的古音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 2.1. 古无四声说

明人陈第最早注意到《诗经》用韵多是“仄以承平”异调相押的现象，他在《毛诗古音考》中解释道：“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岂屑屑毫厘若经生为邪？”后来在《读诗拙言》中进一步指出：“盖四声之辨，古人未有，中原音韵，此类实多。”<sup>[1]</sup>后人或据此认为陈第主张上古无声调，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例如谢纪锋(1992)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四声之辨，古人未有”是说明古人尚不能自觉分辨四声，并不等于说当时不存在声调差别；陈氏之意在于强调不同声调之间“亦轻重之间”，《诗经》用韵出于自然和谐，不必受中古必须同调相押的规则约束<sup>[2]</sup>。无论陈第本意如何，他确实揭示了上古用韵与中古的不同之处，并给出了初步解释。尽管其解释尚属推测，缺乏实证，却为后世古音学家的进一步探讨开辟了道路，引发了关于上古声调性质的不同见解。

### 2.2. 古有四声说

为解释《诗经》中韵脚字不同声调相互押韵的现象，顾炎武提出了他的“四声一贯”说。他在《音学

五书·音论·古人四声一贯》中指出：“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3]他认为上古本有四声，但在诗歌吟唱中可依韵律需要自由转换，“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然而，这种主张实际上使字无定调，近乎消解了声调的稳定性，且其以中古声调框架推演上古语音，不免带有“以今律古”的局限性。

江永同样主张古有四声，在《古韵标准·例言》中写道：“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亦有一章两声，或三四声者，随其声调诵咏歌，亦自谐适，不必皆出一声。如后人诗余歌曲，正杂用四声，诗韵何独不然？”[4]他虽承认四声可杂用于韵段，但反对声调间的随意转读，尤其强调入声当保持本调，批评顾炎武将入声转为平、上、去之说为“大谬”。江永与顾炎武皆预设古今声调系统相同，未能充分关注语言的历史演变。

“古实有四声”的观点由江有诰与王念孙明确提出，并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人不谋而合，均指出上古声调系统确实存在，只是具体字的调类归属与后世有所不同。江有诰在致王念孙的书信中称：“古人实有四声，实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王念孙在回信中亦明确反对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他们通过对《诗经》用韵的细致分析，注意到《诗经》中去声字常与入声、平声、上声字互押的复杂情况，正反映了上古与中古在调类对应上的差异。

在《唐韵四声正》中，江有诰以上古韵语的字调为对象，展开了系统性考察，得出结论：在先秦诗韵里“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然若干字的调类归属与《切韵》时代不同[5]。例如“庆”字后世读去声，在先秦应属平声；“戒”字后世读去声，在先秦应归入声。因为它们在先秦韵文中分别只与平声、入声字相押。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依据，但其论证过程在理论阐发上仍可进一步深化。

江、王之后，清代学者多倾向于上古实有平上去入四声之说，其中夏燮的论述尤为系统。他在《述韵》中总结并发展了王念孙、江有诰的学说，通过分析群经、诸子、《楚辞》及秦刻石等材料中四声分用的实例，进一步论证了上古汉语声调系统的客观存在。夏燮的论述因逻辑严密、例证翔实，在音韵学界获得广泛认同。其主要依据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古人的作品，往往连用五韵六韵乃至十几韵，均为同一声调，而其他声调不相杂糅；其二，《诗经》中一诗之内同为一部的韵字，依四声之别分用不乱；其三，同为一字，分见数处而声调相同。夏燮的研究，标志着上古汉语声调探讨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 2.3. 古无去声说

段玉裁首创“古无去声说”，主张两汉以前汉语只有平、上、入三声，去声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他在《六书音韵表一·古四声说》中明确指出：“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而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段氏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声调系统的演变，认为上古仅有三类声调，去声是后世音变的结果，这一见解标志着清代学者对上古声调的认识进入了新阶段。并且他从用韵及谐声材料中发现去声在上古与入声关系密切，这是他的创见，对后世研究影响深远。

在《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多次贯彻这一主张[6]。例如：

《食部》“饭”字下注云：“……云食也者，谓食之也，此饭之本义也。引伸之，所食为饭。今人于本义读上声，于引伸之义读去声，古无是分别也。”

《肉部》“胥”字下注云：“今音‘相’分平去二音，为二义，古不分。《公羊传》曰：‘胥命者，相命也。’《穀梁传》曰：‘胥之为言犹相也。’毛传于‘聿来胥宇’‘于胥斯原’皆曰：‘胥，相也。’此可证相与、相视古

同音同义也。”

段氏此说有助于解释先秦两汉文献中去声与入声相通的现象，这类现象常见于异文、通假和声训材料中。

然而，段氏的论证亦存在一定局限。其“古无去声”的主张主要基于谐声材料，而谐声系统在反映声调方面的严谨性不及《诗经》用韵。胡安顺(2003)指出，《说文》谐声字并非严格依声调配置声符，因此其在考证上古声调方面的价值相对有限[7]。段玉裁过于倚重谐声材料，相对忽视《诗经》中大量去声自协的韵例，导致其观点具有一定片面性。事实上，《诗经》中既有去声与他调相押之例，亦存在大量去声独用的现象，此为“古无去声说”难以圆满解释之处。

## 2.4. 古无入声说

孔广森立足于其山东方言，提出了“古无入声说”。他在《诗声类》中提出：“案周京之初，陈风制雅，吴越方言未入中国，其音皆江北人唇吻，略与《中原音韵》相似，故《诗》有三声而无入声，今之入声于古皆去声也。”[8]他认为入声乃江左学者，即沈约等人所创，并非中原古音固有。

孔氏此说主要基于两点：其一，误以为四声体系为沈约所创制；其二，其自身方言中入声已消失，故推想中原古音亦无入声。然而，声调作为语言的自然特征，并非任何个人所能创造；且《切韵》作者多来自北方，其音系中仍完整保留入声，足见入声在南北多地本已存在。孔广森以方音推论古音，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失。学界普遍认为，其观点或是受自身方言影响，或是为了配合其阴、阳分部的韵部体系及“阴阳对转”理论而提出，因而未被广泛接受。

## 2.5. 古有二声说

上古实有四声之说，经江有诰、王念孙、夏燮诸家的考证已很明确，但后来的清代学者仍有不同的见解。

章太炎、黄侃主要承袭了段玉裁两分的声调观，段玉裁在《六书音韵表》中提出“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并认为“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章太炎、黄侃进一步申明两分之说，影响甚大。章氏在《国故论衡》中提出：“古平上韵与去入韵塹截两分，平上韵无去入，去入韵无平上。”又说：“入声可舒可促，舒而为去。”黄侃则在《声韵通例》明确提出：“凡声有轻重，古声惟有二类，曰平曰入。今声分为四类，重于平曰上，轻于入曰去。”[9]

然而，这种将上古声调仅归结为平、入两类的观点，在理论和材料上均面临挑战。从理论上说，若上古只有平、入两声，其区别主要在于入声带有塞音韵尾[-p]、[-t]、[-k]，而平声没有，这实质上属于音素层面的差异，而非纯粹的声调对立。若依此推论，一旦入声韵尾脱落，所有字将变为平声，则现代汉语四声系统的来源便难以解释。因此，黄侃的主张在逻辑上近乎否定了上古存在真正的声调系统。

从文献材料来看，“二声说”也难以成立。学者林序达曾对《诗经》及《楚辞》时代不同声调之间的通协情况进行统计[10]，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co-occurrence of different tones

**表 1.** 不同声调之间的通协情况统计

	诗经(次数)	屈宋赋	其他	合计
平、上通协	90	18	52	160
平、去通协	124	31	130	295
上、去通协	59	19	65	142

通协现象反映韵类之间的语音相近程度。数据显示，平、去通协的频率显著高于平、上通协和上、去通协，说明平声与去声关系密切。若按“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框架，则难以解释为何平、去之间的通协反而最为频繁。因此，“古有二声说”在材料层面同样缺乏充分支持。

## 2.6. 古有五声说

王国维在观察《诗经》用韵时提出“古有五声”之说。他注意到《诗经》中凡阳声韵都只有一声，于是认为阳声韵自成一类声调，应与阴声韵的平、上、去、入四声并列，合为“阴平、上、去、入”与“阳平”五声。他在《五声论》中明确指出：“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

然而，这一观点在材料基础上存在明显缺陷。王国维将阳声韵笼统归为另一调类，主要依赖主观归纳，并未系统检验《诗经》中阳声韵的实际押韵情况。事实上，《诗经》中阳声韵押上声、去声的例子并不少见，并非如王氏所言“只有一声”。因此，其“五声说”既与《诗经》押韵事实严重不符，也缺乏可靠的音韵证据，本质上属于一种基于局部观察的主观臆断，未在学界获得认同。

## 3. 近现代学者的研究

经过清代及此前学者的长期探讨，学界已能初步判定上古汉语存在声调系统。主要依据在于，上古韵文中平、上、去、入四声各自独用的韵段数量，远多于异调混押的韵段，这一趋势在统计上表现显著。

严学宥在《周秦古音研究的进程和展望》中指出：“从《诗经》押韵看，大体平上去入同类的字相押，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混押不及半数。”胡安顺(2003)进一步对《诗经》用韵作了细致统计，发现其中同调相押的韵段共 1339 段，约占总押韵段的 76%；而异调混押的韵段合计 416 段，约占 24%。林序达(2009)将统计范围扩展至《楚辞》及先秦其他韵文，结果同样显示同调相押的比例高达约 78%。

这些数据一致表明，同一声调的字相互押韵在先秦韵文中占绝对主导。若无稳定的声调系统，此类规律性现象难以解释。因此，学界普遍认同上古汉语存在声调。

然而，关于上古究竟有几个声调，仍无定论。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去声的问题上。尽管夏燮等学者对“古有四声”作了系统论证，一些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为何谐声系统中阴声字常出现去、入相通，而阳声字则多见平、上、去相关？又该如何解释《诗经》中大量存在的去、入相押及平、上、去互协的现象？这些疑问显示，上古声调系统的具体结构及其历史演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 3.1. 古无去声说

王力有条件地接受了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两人虽都主张上古没有去声，但具体的调类不同，段氏认为上古只有平上入三个声调，而王力主张上古有四个声调，按“舒”“促”分为两大类，舒声分为平、上，促声分为长入、短入，见图 1：



Figure 1. “Shu vs. Cu” classification

图 1. “舒”“促”分类

王力在《古无去声例证》及《汉语史稿》中，从周秦两汉韵文、一字异调及谐声偏旁等材料出发，论证上古声调兼具音高与音长的区别。他提出：“上古声调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的分别。必须

是有音高的分别的，否则后代声调以音高为主要特征无从而来，又必须是有音长的分别的，因为长入声的字正是由于读音较长，然后把韵尾塞音丢失，变为第三种舒声(去声)了。”[11]基于这一理论，他把中古的去声在上古一分为二，一部分去声归到平上声，一部分去声归到入声，是长入，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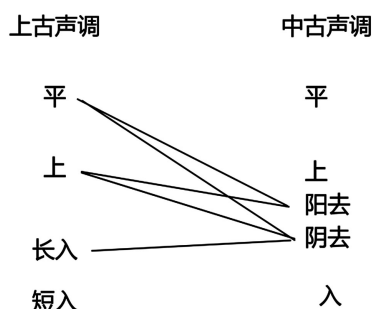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origin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 “Qu Sheng”  
图 2. 中古声调“去声”的来源

王力提出“长入、短入”之分，主要是为了解释部分中古上声字与入声字在上古关系密切的现象。然而，这一说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如雅洪托夫(1959)、谢纪锋(1992)、李葆瑞(1984)、胡安顺(1991)等。主要提出的问题是：

- 1) “长入说”未能清晰、合理地解释去声的来源及其演变路径。
- 2) “长入说”以音长来区别声调无法解释在普通话四声中起重要作用的音高是如何形成的。
- 3) “长入说”只注重了去声与入声的关系，而没有正确对待去声与平、上声的关系。
- 4) “长入韵”发展到中古消变为阴声韵后与其原所配阴声韵的中古韵母——相同，这说明它在上古不是入声韵而是阴声韵。

### 3.2. 古有四声说

周祖谟(1941)在《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中，继承并发展了王念孙、江有诰、夏燮等清代学者的观点，系统论证了上古不仅存在平、入声，亦确有上、去两声[12]。文中，他批评段玉裁“古无去声说”存在两大疏漏：一是“重其合而不重其分”，即过分强调去声与他调通协之例，却忽视了大量去声自协的韵段；二是“重谐声而不重《诗》韵”，即过于依赖谐声材料而轻视《诗经》押韵的实际表现。同时，他也指出黄侃“古无上去”说忽略了上声独用例远多于混押例的事实。周祖谟进一步援引夏燮《述韵》中的论证，并运用《诗经》中同一章内四声分用的材料，证明上古实有平、上、去、入四声，并对上、去二声在古韵中独用与合用的情形作了全面考察，从而夯实了“古有四声”的结论。

史存直曾依据江有诰《诗经韵读》与顾炎武《诗本音》，对《诗经》的声调分布进行了整体统计。他在《汉语语音史纲要》中指出：“一部《诗经》共有 305 篇，1141 章。每一章不一定只有一个押韵单位，所以按押韵单位来说，《诗经》全部共有 1679 个押韵单位，其中四声分押的押韵单位：平声 714，上声 284，去声 135，入声三种韵尾合计 247，一共是 1380 个，在全部押韵单位中所占的百分比竟达到 82.2%。”[13]基于这一数据，他认为上古汉语不仅有声调，且调类系统大致即为平、上、去、入四类，与《广韵》所代表的中古声调系统并无根本不同。

胡安顺(2003)通过对《诗经》用韵及《说文》谐声材料的综合考察，为上古四声的存在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其统计显示，《诗经》中平、上、去、入四声各自独用的韵段数量远超过异调混押的韵段；同时，《说文》谐声系统中，同调相谐的比例亦超过总谐声组的 50%，而异调互谐的总和不足半数。这两组数

据从韵文与文字两个维度共同印证了上古汉语已具备平、上、去、入四声的调类格局。

### 3.3. 辅音韵尾脱落说

上古汉语声调起源是学界热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辅音韵尾脱落说”，该假说认为声调源于音节末尾区别性辅音的脱落，辅音消失后音高差异成为区分音节的核心特征；奥德里古(1954)率先提出此假说并指出汉语去声源于\*-s尾，雅洪托夫(1959)、蒲立本(1963)、梅祖麟(1980)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补充佐证，沙加尔、白一平、郑张尚芳等在该框架下对具体韵尾构拟提出不同见解[14]；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该假说提出质疑，指出其存在公式化、证据不足等问题，但辅音韵尾脱落说的研究方法与材料依据为上古汉语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并且得到了诸多民族语言材料的支持，具有合理的解释力与研究价值[15]。

## 4. 小结

综上所述，上古汉语声调的研究，相较于上古声母与韵母系统，面临更大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直接反映声调的历史材料极为有限，除了《诗经》《楚辞》等韵文押韵、谐声系统及零星对音资料外，几乎别无依凭。材料的匮乏导致各家学说虽基于相近文献，却可能得出不同乃至对立的结论，至今难以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上古存在声调，但在具体调类上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上古主要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此为多数学者所支持；另一种则以王力先生为代表，认为上古有平、上、长入、短入四种声调。从解释力来看，“古有四声说”因更贴合《诗经》等韵文中同调相押占主导的统计事实，且能与中古四声系统形成较为自然地承接，因而接受度更广。

然而，现有理论仍有明显局限，尤其在去声来源、调类数量及四声相互关系的解释上尚未形成圆满体系。未来可以整合内证与外证材料，结合汉藏语系特点，建立严密的逻辑推导框架，厘清去声与平、上、入三声的演变脉络，同时探索上古调类数量的合理构拟，推动上古声调系统研究走向深入。

## 参考文献

- [1] 陈第. 毛诗古音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 谢纪锋. 音韵学概要[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38-240.
- [3] 顾炎武. 音学五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 江永. 古韵标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江有诰. 音学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6]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7] 胡安顺. 音韵学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85-326.
- [8] 孔广森. 诗声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0] 林序达. 林序达汉语史论集[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316-338.
- [11] 王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2] 周祖谟. 问学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13] 史存直. 汉语音韵学论文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14] 马坤. 历史比较下的上古汉语构拟——白一平、沙加尔(2014)体系述评[J]. 中国语文, 2017(4): 496-509+512.
- [15] 潘悟云. 东亚语言声调起源的内因与外因[J]. 韵律语法研究, 2019(2): 1-17.